

爱民为民的循吏

□ 石志刚

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民本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。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循吏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。古代循吏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政声留在了民间，成为人们传颂的对象。

敬民之心

南宋名臣范成大不仅在诗词方面颇有建树，在从政为民方面也政绩卓然。淳熙元年十月，他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深受宋孝宗重托，他决心以“既来万里，敢计一身”的精神治理好西南屏障。

在蜀期间，范成大的敬民之略得以施行：“得民有道，仁之而已。省徭役，薄赋敛，蠲其疾苦而便安之，使民力有余而其心油然。”范成大大到蜀地后，看到蜀民赋税沉重，于是他提倡免除酒课。蜀地的酒课是南宋时期以对金作战为由而征收的杂税。蜀民承担了繁重的酒课任务，生活苦不堪言。淳熙二年六月，范成大大奏朝廷，希望朝廷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逐年废除蜀地的酒课，得到了宋孝宗的批准。蜀民得知这一消息，非常高兴，修建道场，以表感恩之情。

蜀地的和杂政策施行成为蜀人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。和杂本意在于百姓将手中物资上缴给官府，官府给付其钱，百姓和官府之间形成一种约定性契约。然而在实践中过程，官府经常压低价格，强行征收百姓手中物资；官仓中的物资却被豪族巧取豪夺，当地百姓苦不堪言。范成大了解了和杂政策的弊端，向宋孝宗作了报告，经过范成大的努力，和杂政策被

永久性废除，减轻了蜀人的负担。

范成大由于敬民而亲民，因亲民而采取了惠民之策，得到了蜀人的爱戴。他离开蜀地的时候，蜀人从成都合江亭将其送到青神中岩寺，仍不忍离别。范成大的在其诗中也记录了这一时刻：“明朝真是送人行，从此关山隔故情。道义不磨双鲤在，蜀江流水贯吴城。”在他离开蜀地后，宋孝宗向他转告蜀人对他的思念：“蜀民思卿如慈亲。”

为民之心

清前期名臣王骥在顺治十二年中进士，当时他已经43岁。走上仕途后，他为民效力，政绩卓越，受到康熙的赞许。康熙二十四年，王骥因政绩卓越被转任到直隶当官。当时，工部责定四川供给朝廷2663根楠木，用来修建太和殿。王骥在蜀地为官5年，深知蜀道艰险，运输不易，且蜀地刚经战乱，民生凋敝。身在直隶的他当即决定为民请命，向康熙陈辞。

在陈辞中，王骥陈说用蜀地木材会遭遇两难。一难在于伐木难，蜀民跋山涉水、深入陡坡，砍伐树木，实属艰难。二难在于运输难，从山林中将木材运到船上，经过激流险滩和弯曲河溪，才能运出山区，比之平原更难。如果要求蜀民砍伐木材加上运输之费，不仅影响蜀民自身农业生产，而且周期太长，也影响太和殿工程建设。

康熙看了他的陈说之后，感同身受地说：“蜀中屡遭兵燹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朕非常痛心，岂能再增加他们的困苦。”康熙于是放弃了从四川取楠木的想法，转而从塞外想办法。蜀

民由此得福，对王骥非常感激，作《松成治绩略》来赞扬他的功绩，并为他绘制图像，为后人传颂。

此后，王骥又赴任江西巡抚，在江西，他依然秉持一颗为民心，清正廉洁，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，作出了业绩。之后又任户部尚书，在任上，他为民理财，一丝不苟，清介如故，得到了康熙的认可：“凡事实心办理，操守清廉。”

爱民之心

郑板桥是深具爱民之心的典范。他在知天命的年纪出任河南范县县令。范县历来贫穷落后，郑板桥来到县衙时，看到的是东倒西斜的破草屋，“麻雀墙仍缺”。破陋的环境、艰苦的条件没有阻碍他的决心和信心。他着意改善民生，最终作出了“清河得意”的政绩。在范县干了4年后，郑板桥被调到山东潍县当县令。虽然潍县经济较好，但是当时遭遇旱涝等自然灾害，受灾面积较大，持续时间较长，加之当地官员没有据实上报，地方豪族乘机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，致使百姓民不聊生，当地外出逃荒的人络绎不绝。

郑板桥在他上任潍县后写的第一首诗《逃荒行》，即再现了当时潍县百姓度日如年的惨状：“十日卖一儿，五日卖一妇，来日剩一身，茫茫即长路。”为了解决民生问题，郑板桥采取了“三步”法。第一步，带头捐款，赈济贫困。自己带头捐出俸禄，作出示范效应，以缓灾情。第二步，上报灾情。当时山东官场存在瞒报灾情现象，郑板桥打破常规，据实上报，虽遭到上级官员的打压，最终

还是辗转将灾情上报给了朝廷，得到乾隆的支持，为朝廷查问督办灾害提供了依据。第三步，开仓赈贷。清代朝廷在各县设有粮仓，归国家专管，用于救灾。如果用此粮仓，必须执行严格的申报请示制度，因为申报请示时间较长，很多灾民等不到开仓时间，就已经成为饿殍了。郑板桥当机立断，“不俟申报，即出仓以贷”。在郑板桥的努力下，潍县百姓度过了灾荒。

郑板桥出身于社会底层，进入仕途后，又长期接触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，加之受儒家思想影响，他由此形成了浓厚的民本情结。他写道：“想天地间第一等人，只有农夫，而士为四民之末。”为什么农夫是“第一等人”呢？因为农夫“皆苦其身，勤其力，耕种收获，以养天下之人。使天下无农夫，举世皆饿死矣”。郑板桥经常拿出薪俸来捐助贫困百姓，还劝诚家人也要对百姓多加尊重。

郑板桥的诗歌中也常常关注民情。在《田家四时苦乐歌》中描绘农夫的生活：“夜月荷锄村犬吠，晨星叱犊山沉雾。到五更惊起事荒鸡，田家苦。”在《潍县竹枝词》中，他描述了被豪族兼并土地的农夫不幸的命运：“绕郭良田万顷畴，大都归并富豪家。可怜北海穷荒地，半篓盐挑又被拿。”他对百姓的牵挂无处不在诗歌中流露。



一回没有发火，他看了看身边的大臣，不无骄矜地说：“笔公果如朕所卜，可谓社稷之臣。”

正平二年（452年）二月，当权宦官宗爱弑杀了太武帝拓跋焘，拥立拓跋焘六子南安王拓跋余为帝，同年十月，宗爱又弑杀拓跋余，尚书陆丽等诛杀宗爱，拥立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，是为文成帝。文成帝即位之后不久，古弼因参议政事不合皇帝旨意被诛杀。

千载谁堪伯仲间

孔子曾对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大加赞叹：“直哉史鱼！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。”——史鱼可真的是正直啊！国家清平的时候他像箭一样直，国家昏乱的时候他仍像箭一样直。古弼就是这样一位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像箭一样直的刚直忠贞之士。

古弼以直道事君，屡屡跟皇帝对着干，一再违拗太武帝拓跋焘的旨意：因急于为民请命，他胆大包天，搅乱皇帝棋局，还当着皇帝的面狂殴妨碍其奏事的宠臣；为确保京城万无一失，他拒绝执行皇帝诏命，将弩马分给皇帝去打猎，而把壮马留下来供自己守城备战；为使百姓秋收不受损失，他抗旨不遵，拒绝征调民车去北山运载猎物，还上表申辩，力陈其弊。真可谓“社稷之臣功盖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”。

虽然古弼的“冒犯”也曾惹得太武帝拓跋焘七窍生烟，甚至咬牙切齿地放出狠话“朕还台，先斩此奴”，但最终都幡然醒悟，依然将古弼倚为股肱，充分发挥其在镇国家、抚万民中的柱石作用。然而，古弼还是这个古弼，还是这个一如既往地殚精竭虑、忠心耿耿、以直道事君的古弼，到了文成帝拓跋濬朝，没过多久，便因参议政事不合皇帝旨意丢掉了脑袋，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慨叹和深深的思索。



群雄逐鹿，秦取六国，是一场激烈的全面对抗，远削近攻、蚕食天下，是稳中求进的战略绝配。远削大国，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，蚕食近攻，坚持不懈积累点滴实利，是“求进”重点。向何处攻，向何处进，是关键所在。

全局之谋

至昭襄王时代，秦远削近攻的目标选择逐步演化为三重考量的综合标准：一是远近之测，三军未动粮草先行，必须事先为可能爆发的军事行动规划最佳后勤补给路线；二是大国平衡，如何稳得实利又“吃相”优雅，尽量减少惊扰各方；三是地缘利益，犹如围棋落子，必抢“金角银边”，求地利之便。以全局之谋，取一域之胜，是远削近攻的要义所在。秦据此图强，夯实了雄视六国的根基。

秦东出函谷关，攻伐频繁，看似杂乱，实有章法，战略目标始终锁定在沿河而进和占领上党。以削弱齐楚为远图，以蚕食三晋为近谋，秦占领上党的意图越发清晰起来。如果秦国东进有路线图，那么宜阳、野王、上党是三个关键节点，取宜阳以裂韩国，取野王以震三晋，取上党以收天下。

层层剥笋

上党据天下肩脊，“郡地极高，与天为党，故曰上党”。除了地理位置重要，上党还是三晋的交界处，赵魏韩在此犬牙交错，韩在西南，赵居东北，魏位于东南。三晋和，则上党固，三晋分，则上党亡。昭襄王中期，赵为了解决、消化“心腹之患”中山国，和秦达成重大谅解，以求西线安宁。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秦牢牢抓住了这段难得的战略机遇期，小步快走，稳扎稳打，全面蚕食河东和上党的三晋故地。

在黄河南侧，秦反客为主，于公元前293年取得伊阙大捷，消灭韩魏联军二十余万，公元前291年又攻克韩国重镇宛。在黄河北侧，秦军同样势如破竹，魏韩割地求安，公元前290年，秦得魏之河东四百里、得韩之武遂二百里。紧接着秦攻克魏之垣、軹，甚至公元前289年一年之内豪取魏国蒲阪等六十一城，彻底清除了魏在河东势力。秦犹如手法细腻的大厨，层层剥笋，渐抵要害，至此上党西侧已经完全敞开。

谋定后动

秦近攻上党，蚕食三晋，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，比实力，也比技巧，更比定力。

昭襄王二十七年（公元前280年），秦启动了针对上党的实质性行动，选择赵国光狼城，一鼓而下。胜利往往让人难以保持冷静，尤其是一连串胜利。昭襄王三十八年，秦被赵国的虚假换地协议欺骗，因怒发兵，打乱了固有的节奏，直接深入上党腹地，试图教训赵国，却在阝与之战中大败。

虽然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但是阝与之败彻底警醒了秦国，在没有完成对上党地区的包围、分割，并建立牢固的后勤补给线路之前，与三晋尤其是赵国在上党较量绝非明智之举。赵之上党深居腹地，山壑纵横，补给极为不便。从地缘格局看，若攻强赵，必先削韩魏，循序渐进，最为稳健，秦开始专注于清理上党外围。

上党“命门”当在韩之野王。野王若失，韩分南北，魏分东西，赵也有拦腰截断之危。公元前275年，秦在华阳之战中歼灭十五万魏赵联军，消灭了三晋联合的火苗，魏国被迫向秦割让南阳之地，包括了太行山以南、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，原是连接魏国东西两部的关键孔道，也是秦挺进中原的要冲。昭襄王四十三年（公元前264年），白起军团进攻韩之郢城，斩首五万，占领了曲沃地区。次年，秦首攻韩之南阳太行道，“绝之”，紧接着又兵临韩之野王，野王降秦，“上党道绝”。

秦得野王，完成了对上党地区

近攻上党

□ 崔 庆

的C型包围，从西、南两个方向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。原本包含在三晋心腹之中的上党，已是秦军眼中的“盘中餐”，全面攻取上党的时机成熟了。

敌为我动

三晋之中，只有赵国有理由、有实力能与秦在上党一较高下。秦也将赵视为最强劲的对手，两国争夺上党将是影响各自国运的战略对决。

阝与之战的教训近在眼前，秦深知在上党腹地作战的艰难。如果能把赵军主力吸引到南部上党，秦军将会胜算大增。只要掌握南北走向的“太行径”和东西走向的黄河沿线，依靠野王固守运转枢纽，充分利用水道运输，秦军可以减轻补给压力，提升军事投送能力。如遇战事不利，便于打持久战，甚至可以在上党反客为主。长平所在的晋城盆地正是这样的理想场所，但如何让赵国就范，吸引赵军主力进入理想的预定战场呢？

长平之战的直接“导火索”是韩之太守冯亭献地于赵，如果细致分析此战的起点和终点，就会发现两个疑团。一是冯亭献地是执行谁的命令？二是冯亭的后来“华阳君”封号是谁给的，他的后代为什么在秦国受到重用？

根据史料记载，冯亭担任上党太守的时间非常短，仅仅一个月。秦得野王，韩国没有太多选择余地，丢车保帅是无奈之举，主动放弃上党，以求喘息之安。但是，当时上党太守靳黈不认同、也没执行韩王的决定，执意要死守到底。于是，韩王临阵换将，派遣冯亭替换靳黈，以落实献地计划。此献地非彼献地，韩王是让冯亭献地于秦。然而仅仅一个月后，冯亭以“民皆不欲为秦”为由，将上党十七城献于赵，不仅引发长平大战，而且将赵举国精锐悉数吸引到了南部上党地区。

冯亭是韩、赵、秦之间的关键人物，《史记》在《白起王翦列传》中记载了其因献上党被封为“华阳君”，《赵世家》却没有提及此事。“华阳君”一直是秦国的重要封号，昭襄王的重臣华阳或曾为华阳君，孝文王正室为华阳夫人。作为地理概念，华阳一是指华山之阳，二是指韩都城新郑之北的华阳城，在长平之战前，这两个地方都为秦所控制。冯亭的“华阳君”是不是作为“诈献”上党、将赵军引入预定战场的丰厚回报呢？历史还在迷雾之中。但有一点十分清楚，冯亭的一支后人入秦受到重用，将相并出，成为显赫的政治家族。

庖丁解牛，重在肯綮。“以无厚入有间，游刃有余地矣”，秦人尽得其妙。远削近攻，随势而动，应时而变，秦雄视天下，是实力法则和全局谋划的双重胜利。



□ 刘立祥

古弼，南北朝时北魏大臣，代地（今山西代县）人，鲜卑族，历仕明元帝拓跋嗣、太武帝拓跋焘、南安王拓跋余、文成帝拓跋濬四朝，历任侍郎、门下奏事、立节将军、侍中、尚书令、吏部尚书、安西将军、司徒等职，封灵寿侯。古弼三件太武帝拓跋焘的故事千古流芳。

暴打刘树搅棋局

据《魏书·古弼列传》，古弼“少忠谨，好读书，又善骑射”，深得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喜爱。泰常八年（423年）十一月，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以后，更加受到信赖与重用，拜为立节将军，赐爵灵寿侯，率军南征北战，征并州、屯五原、击平凉、镇长安、讨仇池，屡建功勋。后以功升任侍中、吏部尚书，主管南部奏事。

某日，古弼收到一封来自上谷地区民众的《请愿书》，说是上谷的皇家苑囿占地太广，扩张得太离谱，以至于这一带的老百姓都无田可种了，恳请朝廷适当缩小苑囿规模，给老百姓留一点儿耕种的土地。

古弼读罢《请愿书》，心急如焚，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因为眼看春耕时节即将来临，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，必须马上去上奏皇帝，使上谷百姓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。

古弼急匆匆赶到皇宫，可事不凑巧，拓跋焘正与给事中刘树在棋枰上纵横驰骋，杀得难解难分。拓跋焘兴趣正浓，全神贯注，只顾与刘树纵情厮杀，连看都不看古弼一眼。古弼只好耐着性子在一旁等候。

左等右等，拓跋焘与刘树越杀兴致越高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丝毫没有鸣金收兵的迹象。古弼等来等去，不由等得火撞顶梁，古弼忽地站了起来，在皇帝面前揪住刘树的头发，把他拉下矮凳，用手扯住他的耳朵，以拳头捶击着他的背说：“朝廷不理政事，都是你这帮小人的罪过！”

拓跋焘脸色都变了，十分尴尬，悻悻丢下手中的棋子说：“放手吧，



北魏重臣古弼

放手吧，没有听你奏事，错误在我。刘树有什么罪过？放过他吧。”

古弼把上谷百姓上书一事报告了拓跋焘，拓跋焘十分赞赏古弼的正直，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请，准予把苑囿多占的田地分给百姓。

事后，古弼觉察到自己作为臣子当着君王的面殴打大臣，不能说无罪，于是，便主动到公车令那里，脱去帽子，光着脚，自劾请罪。拓跋焘遣使者将他召回，对他说：“你穿戴好鞋帽吧。我听说筑社的人，艰难地把社坛筑起，又恭恭敬敬地去侍奉社神，神便赐福于他，那么你又有什么罪呢？从今以后只要对社稷有利，益国便民之事，虽然鲁莽不合规定，你只管去做，不必顾虑。”

老弱弩马给皇上

拓跋焘率部浩浩荡荡到河西打猎，命古弼在京城留守。某日，拓跋焘遣使降诏，命古弼把健硕肥壮的战马拨给攻猎骑士，而古弼却公然违抗圣旨，专门把那些老弱弩马送到河西打猎。

拓跋焘围猎兴头正盛，看到从京城调来的没精打采的弩马，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“世祖大怒曰：‘尖头奴，敢裁量朕也！朕还台，先斩此奴。’”

皇上雷霆震怒，消息传到京城，古弼的下属一个个都成了霜打的茄子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料想在劫难逃。

古弼脑袋长得尖，时人呼之“笔

公”，拓跋焘常昵称之为“笔头”，烦恶时则呼之“尖头奴”。古弼安慰大家说：“作为人臣，我以为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，即使有罪，这个罪也是小罪；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，不做必要的防范，使敌寇随意自由侵入，这个罪可就大了。现在，北方的柔然人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南侵，南方的宋国也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北上，我们把肥壮的战马留下来为军队使用，以备不测，如果为此而死，死得其所！不要怕，明主是可以道理来说服的。再说，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不必为此忧虑。”

有人将古弼的这番话如实地汇报给拓跋焘，拓跋焘随之转怒为喜。“世祖闻而叹曰：‘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！’赐衣一袭、马二匹、鹿十头。”

拒征民车驰攻猎

河西围猎归来不久，拓跋焘又烦腻了宫中的单调生活，再次出宫，在车驾卫队的簇拥下到北山打猎。这次围猎收获颇丰，捕到麋鹿几千头。拓跋焘大喜过望，遣使给古弼下达诏书，命古弼速发牛车500辆，前来运送猎物。

诏书发出以后，拓跋焘忽然醒悟：前车之鉴不远，以古弼的忠直不阿，他怎么可能遵旨遣发牛车呢！于是，对随从的大臣们说：“笔公一定不会给我征发民车来，我们在这儿等来等去终归还是一场空，你们干脆就用马把麋鹿运回去吧，这马也比牛车快。”

拓跋焘命令攻猎的队伍拔营返回，走了一百多里，不见古弼发来的一辆民车，却迎面碰见了遣送诏书的使者。使者向拓跋焘呈上古弼的奏表。拓跋焘打开奏表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如今秋谷已黄，麻菽遍野，正是收获的季节，野猪麋鹿不停地到农田里来糟蹋庄稼，鸟雀也不断地来啄食粮食，加之风吹雨打，农人日夜抢收，依然损耗严重。征调民车之事，请赐稍得缓行，以不误农时，尽快收获粮食。”

面对古弼的抗旨不遵，拓跋焘这